

教师人文读本

修订本

总主编 张民生 于漪

下册

执行主编 商友敬 尹后庆 吴国平

JIAOSHIREN WEN

DUBEN

上海辞书出版社

教师人文读本

修订本

总主编 张民生 于漪

执行主编 商友敬 尹后庆 吴国平

JIAOSHIRENWMEN

DUBEN

下册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师人文读本/张民生,于漪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6
(2006.8重印)

ISBN 7-5326-2053-0

I. 教... II. ①张... ②于... III. 人文科学—师资培训—教学参考资料 IV. C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8056 号

教师人文读本(修订本)

(全二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35.5 插页 4 字数 725 000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 101—8 350

ISBN 7-5326-2053-0/G·617

定价: 5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55043115

目 录(下册)

第一单元 思想的诞生

爱国的坐标	2	资中筠
偶像破坏论	10	陈独秀
个人之改革	13	杜亚泉
思想的诞生	17	陶菲格·阿基姆
我的世界观	21	爱因斯坦
关于思考	25	叔本华

第二单元 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33	李 中
信条	39	弗洛姆
其兴也勃	45	潘旭澜
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	50	张汝伦 王晓明 朱学勤 陈思和
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	59	周国平

第三单元 多说民主的好处

科学与民主	65	顾 准
灯下漫笔	69	鲁 迅
“文革”博物馆	74	巴 金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开气	77	龙应台
多说民主的好处	81	谢 泳

第四单元 当权力在手

当权力在手	84	龙应台
底层	90	蔡 翔

在雅典法庭上的演讲	98	苏格拉底
文体与精神分裂主义	102	韩少功
后一种可能	106	王小明
第五单元 传统与现代化		
传统与现代化	115	张 灏
论传统与反传统	126	王元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140	余英时
中国文明如何定位	144	资中筠
究竟什么是中国的文化传统	155	葛兆光
第六单元 人,诗意地安居		
人,诗意地安居	165	海德格尔
病隙碎笔(节选)	168	史铁生
人生的境界	179	冯友兰
伊壁鸠鲁的快乐清单	185	阿兰·德伯顿
致读者	193	赫钦斯
第七单元 什么是教育		
什么是教育(节选)	205	雅斯贝尔斯
教育的目的	211	怀特海
教师的作用	221	罗 素
多元智力理论的前世今生	228	加德纳
教育的四大支柱	23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育漫谈(节选)	237	阿 兰
第八单元 我的教育信条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244	蔡元培
开学致词	247	凯斯特纳
论教育	251	爱因斯坦
我的教育信条	254	杜 威
适应环境	262	赫钦斯
教育者之人格	270	经亨颐
鸣谢	272	

第一单元

思想的诞生

爱国的坐标

资中筠

资中筠(1930—)，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及《美国研究》主编。

本文是作者为袁伟时的著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所写的书评。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提倡爱国，但是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近代中国那样以之为最高道德标准，尤其对知识分子说来“民族大义”高过一切。中国古代主要是“天下”的概念，“国家”的含义随时代而异，“爱国”和“忠君”紧密相联。应该说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是鸦片战争之后被列强的炮舰激发出来的，所以爱国也有了新的内涵，那就是面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何以自处，何以自救。在这一时代命题的召唤下，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半个世纪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从事各种革新探索的思想家，学术讨论终于跳出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圈子，也可以说是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接近于百家争鸣的局面。对于这一批人物，站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在中国人又经历了一次灾难性的闭关锁国之痛，再次带着复杂的心情面对世界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谁个进步，谁个反动，谁个爱国，谁个卖国，也就是把坐标放在哪里给他们定位？如果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了。相当一个时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沉浮于我脑海中，近读《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袁伟时著)一书颇受启发，史学非我专，不敢妄写书评，只是借此抒发一些久积于胸之见。

抵抗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这是每一个爱国者的本能。但是当时严酷的现实是败局已定，中国已无可否认地落后了，惟有反躬自省奋发图强才能自救，而图强之道又恰恰需要向给自己造成了这么多痛苦的西方列强学习。19世纪下半叶的有识之士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的不同遭遇正在于这“不同程度”：中国究竟落后在哪里；在当时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如何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对自己最有利；如何全面、客观地认识西方国家；学什么、改什么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

落后状况,推动历史前进,这是衡量每个人的言行主张的坐标。一系列的人物:魏源、林则徐、郭嵩焘、徐继畲、王韬、郑观应、洪秀全、洪仁玕、曾国藩、李鸿章等等都要以这个坐标重新定位。

《晚清》一书从林则徐与郭嵩焘的荣辱对比开端,层层深入。林则徐是伟大爱国者,也是第一批放眼世界的先驱之一,史有定论。他除一度遭贬抑外,生前身后备受尊荣。但是比他晚20年走上历史舞台的同样也是坚决主张禁烟并积极参加两次反侵略战争的郭嵩焘,命运却大不相同。他生前遭到朝野的非议,戴着“媚外投降”的恶名郁郁以终,直到今天的某些历史著作中对他仍有贬词。二人差别究竟何在?事实上,正是由于郭嵩焘晚了20年,对中国的根本弱点认识更加深刻,主张向西方学习方面更为彻底,走得更远。作为第一任驻英国公使,他有机会亲眼考察西方国家,最终痛苦地得出了中国不但在物质上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教养上全面落后的结论。他彻底改变了几千年的夷夏观念,甚至说西方“视中国亦犹三代之视夷狄也”。这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怎么能被接受?他还认定英国之强,在于其立国之本是议会民主制加民选市长制,这是它的“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二者相辅相成以成其富强,而造船、制器等等又是“其末中之一节”。凡此种种不但主政者听不进,也远超过传统士大夫所能接受的理念。所以他报送朝廷如实记录他所见所闻的出使日记,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振聋发聩的作用,反而在大臣中痛遭诋毁,竟至政府下令毁版,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在郭嵩焘之前与林则徐同代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已经批判了华夏中心论,已经认识到朝政的腐败不在于明主还是昏君而是制度问题,并对西方民主有了模糊的向往,不过当时他的言论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也就免去了因此获罪。与郭嵩焘差不多同时的王韬、郑观应、冯桂芬、薛福成以及第一个留美归国的容闳,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相同的思想。他们在向西方学习问题上的主张归纳起来就是说:西方的长处并不止于物质文明,同时也在政治制度和精神文明,中国要改革应学其根本,包括改革政治制度。不过他们本身是传统的士大夫,而且为了能为当世所接受,都煞费苦心尽量从传统文化中找依据。王韬提出了东西方“圣人之道”相通的理论,而且说“泰西诸国今日所挟以凌侮我中国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受欺凌之后能够看出对方所恃之强正是实现人类共同进步的条件,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何等的眼光和识见!当然他不可能像与差不多同时代生于欧洲的马克思那样提出人类发展普遍规律的理论。

另一个不断遇到的问题是主战与主和之争。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郭嵩焘、王韬、徐继畲等人都是基本上主张对列强以和为主的方针,避免主动挑衅。其所根据的第一个前提是敌强我弱的态势,要奋发图强也需要时间,这是和的必要性;第二个前提是对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目标的估计,他们的基本看法是认为西方国家确有“囊括四海”的野心,但是其手段是通过贸易,对中国的基本要求在于通商求利,而不是灭亡和占领。从

这一估计出发，中国“迎其机而导之，即祸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转而为我用”，这是和的可能性。再进一步是与外国交往中占不占理的问题。侵略与被侵略者之间有没有理可讲？郭氏仔细研究酿成“夷祸”，一辱再辱的惨痛经验教训，发现清政府处理失当，站不住理之处甚多：“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撻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这几句话掷地有声，生动地概括了清王朝外交的昏庸和进退失据，《晚清》用了“泣血自省”字样，确实道出了郭氏深切痛苦的心情。

这里涉及一个具体问题：对于已经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该不该遵守？中国过去盛时所提倡的示天下以“信”的立国之道是否还适用？揣情度理，既然不平等条约是战败后被迫签订的，那么这一条约也就是当时力量对比的纪录。更何况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军事强弱之势，而是全面的、深刻的差距，改变之道在于先自图强。同时，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是国家信誉所系，今天签字明天推翻，既足以招祸又必然进一步失去尊严。例如僧格林沁诱击根据《天津条约》而来的英国船之役，一时“天下称快”，结果招致1860年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造成更加惨重的破坏，最后续订更加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对于僧氏之举，从郭嵩焘到曾国藩都曾强烈反对，曾国藩甚至认为他闯下这么大祸“义当杀身以谢天下”。但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僧格林沁气忿地打了洋人都被认为是爱国义举，虽败犹荣，而郭、曾的见解则有提倡媚外降敌之嫌。问题在于审时度势，靠这种突然袭击，甚至辱其使臣的做法能否扭转局势推翻刚刚签订的条约？谁的主张更能保护人民的利益，避免更大的损失？如果不从意气出发而以理智的负责的态度考虑，答案应该是清楚的。

由此派生出的问题是：群众性的排外行动与同仇敌忾的民族正气如何区分？英明的统治者应善于区分不同情况，正确引导。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进行政策教育”。再进一步则是把“民气”引导到励志革新图强以取得真正与外国平等的资格，如以明治维新为开端的日本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昏聩而怯懦的清政府是完成不了这一任务的。它的做法正好相反：自己无力保护国家人民的权益，也不敢真正发动和依靠群众抗击侵略，却幻想个别、零星、自发的反抗，甚至是乌合之众的盲目行动可以推翻自己订的城下之盟，始而鼓励群众以卵击石作无谓的牺牲，失败招祸之后又屈从于外国的压力翻手加以镇压。慈禧对待义和团当然是众所周知的典型例子。《晚清》一书所举道光三十年（1850年）福州神光寺事件，虽是小事一桩，却也颇说明问题：两名并未见劣迹的普通英国人在福州城里租屋半年，却引起轩然大波，以告老在家的林则徐为首的一派主张立即强行驱逐其出城，并且摆出不惜为此一战的姿态；闽浙总督刘韵珂和福建巡抚徐继畲则出于“不敢启衅边隅”的考虑，主张采取缓和手段挤得他们最多住到租约期满就离去。就是这一缓急的分歧在当时却惊动了朝廷，徐氏等人被皇帝斥为“抑民奉

夷”，屡次降旨追查。半年后两个英国人被迫离去，实际上是按照刘、徐的方针平息的风波，但二人旋即被免官。今天看来如此小题大做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在徐、林之间，显然徐的主张较稳妥而负责任。当时皇帝不察，处理不公，这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也不足为奇。问题是至今在有些历史著作中对这一事件仍以强硬主张为是，以徐继畲为对外妥协投降。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长期以来我国无论是在写历史中或是在现实的宣传中有一种塑造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的习惯，进而在意见上也变成绝对正确，这种不客观的态度比比皆是，岂独对林则徐一人以为然！其实林则徐在这一件小事上意见不当决无损于他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形象，而在思想上，到19世纪中下叶，不少人物已经比他更为前进，更加开阔，这也是事实。不过徐继畲等蒙冤更本质的原因还在于在是非判断中一个最经常起作用的因素，那就是把排外与爱国混为一谈。因此自鸦片战争之后几乎所有中国人驱赶和打击洋人的举动不论情节如何都受到讴歌，包括上述僧格林沁大沽口之役。

当然，进、退、和、战都只能审时度势个案对待，不可一概而论。暂时忍让与一味退让以求苟安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一套利用争取来的和平环境励精图治的方略以及付诸实施的决心。这也正是这一批改革者与腐败的清廷的根本区别，自不能以“主战”还是“主和”划线。

同样，撇开传统的定论，从思想史的角度，以是否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思想发展提供新的内容为尺度评论洪秀全与曾国藩的思想和言行，就很难得出曾国藩一定反动、洪秀全一定进步的结论。洪氏所设计的和部分实施的“天国”蓝图在政治上是中央集权而等级森严的专制王朝，在经济上是小农经济和企图消灭私产的空想平均主义，高度集中，一切官办，适足以限制生产力发展，却不足以限制特权的膨胀。他以基督教为旗帜，吸收的并非它的现代精神而是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实质上也就是篝火狐鸣的翻版。按照洪秀全的理想如果成功地取代了清王朝，不可能推动中国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他的思想实际上落后于前面提到的一批知识分子。太平天国有一个洪仁玕提出了代表当时先进思想的建国方案《资政新篇》，但是他到南京时已是“天京事变”之后，这个政权已经腐朽，洪秀全虽然在短期内曾让他总理朝政，却不可能也无力采纳他的改革方案。所以洪仁玕的思想不能代表太平天国的主流。

从这里联想到对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的看法。如果从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有助于还是有助于人类的解放和文明进步这个标准来衡量，就很难得出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普遍意义的结论。试看历史上各种聚众造反的农民领袖哪一个提出过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思想，或有别于建立君主专制王朝的政治理想呢？中国历代农民运动由于没有先进的思想指导，所以都归于失败，这已是共识。既然没有先进的思想指导，如何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如果成功了又当如何？《水浒传》作为文学作品确是不朽名著，但是试设想，这批梁山好汉如果真的坐了天下，

会有比宋王朝更利民的治国方针吗？当然文学作品不能当历史教科书来读，过去赋予它这样的角色是不正常的。诚然，反抗总是由压迫而来，是“官逼民反”，百姓总是愿意安居乐业，忍无可忍才会揭竿而起，因此“造反”可能有一定的“理”，并且值得同情，但造反不等于一定具有进步性，不能以唯成分论对待之。相反，这种造反的手段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规模越大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破坏越严重。农民运动固然有迫使地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的作用，例如轻徭役、减赋税，但是并不能改变生产关系，无法打破压迫——反抗——改朝换代——新的压迫——新的反抗的循环模式，而正是这种模式使几千年中国的生产力发展缓慢，政治上更跳不出君主专制的体制。马克思说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马克思：《中国纪事》）这段话过去一向为我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回避。不过话又说回来，太平天国确有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运动不同的历史作用，那就是它所冲击的是中国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的王朝。如果说彼时的中国只有彻底推翻这种王朝统治才有出路，那么太平天国在破坏生产力的同时，给了本该灭亡的清王朝以致命的一击，客观上为以后的种种改良和革命扫除了一定的障碍。也就是它的作用恰恰在于“破”，而不在于“立”。当然不可能要求马克思预见到此后中国发展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

至于曾国藩，对这个复杂的人物已有许多雄文巨著予以评说，近年来渐趋公允平实。就以与本文主题有关的那部分而言，曾氏所提出的改革主张以及一整套思想显然更切中时弊，更富建设性。他以吸引和培养人才著称，许多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包括第一批科学家都曾是他的幕府。他所创始的洋务运动尽管有种种缺点，发展工业总比太平天国的小农经济进步，从中国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论，多少向前推动了一步。但是曾国藩致命之处在于没有摆脱爱国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他的政治主张及其实施结果都是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最后连他自己都只有急流勇退以避祸。正因为处于这个悖论之中，功之、罪之，令史家争论不休。撇开政绩不谈，曾国藩至少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

晚清这一批改革派所见所识，不论自己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必然会从根本上动摇存在了三千年的社会秩序，甚至触及许多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这种思潮之能够形成，而且居然能成一定的气候，是与外来的威胁分不开的。不管国门打开的过程是多么痛苦多么屈辱，在此之前，在封闭的自我循环的封建社会中即使偶有足以引发根本性改革的新思想，如魏源在19世纪20年代的某些见识超前的言论，只能停留在思想的火花，没有成长的土壤，形不成思潮。到了外来威胁使朝廷时时刻刻有危机感的时候，执政者多少也意识到需要某种程度的“变”，所以对改革论者才能容忍于一时。但是这容忍是极其有限的，一切应变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皇权以图苟安，而

不是从根本上强国富民,只有在二者暂时吻合之处才采纳一些积极的建议。无知颀预加偏见和私利,这个政权已彻底腐败,注定了不可能完成自我革新的历史任务。

不幸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决定了他们无论有什么真知灼见只能借助掌握政权和军权者来实现。王韬的曲折的经历最能说明这一点:出自传统士大夫的本能,他先也曾走向统治者建言的道路,以冀自己强国克敌的主张用于当朝,在太平军席卷江南时还曾为“平叛”上条陈;但是在回了一次太平军占领的家乡见到洪仁玕之后,又对太平天国产生希望,化名为之出谋划策,为此以“附逆”罪被迫逃亡香港;他在去世前三年还曾见到孙中山,为他润色上李鸿章的意见书。从传统的道德观来看,他是变节动摇,不能始终的投机分子;从以农民运动为革命正统的观点看,他有“反动”历史;从狭隘民族主义观点看,他先在上海租界受雇于洋人,后又在英帝国主义庇护下苟活,堪称“洋奴”。但是从怎样才能救中国这个标准看,那么王韬处大动乱之世,来往于当时中国仅有的两大政权之间,向在位者推行自己的救国主张,与当年孔子周游列国在本质上并无大区别;流亡香港非其所愿,但恰恰是在此期间他建树最大,为开创中国现代新闻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所以,无论在朝在野,这一批以救国为己任的饱学深思之士在我国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熠熠闪光的篇章,其中许多思想直到今天仍未过时,而改革的实绩却不大。尽管他们所承袭的是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是非常入世的,他们的确也曾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主张鼓与呼,但最后,罢官的罢官,退隐的退隐。两个旷世奇才:魏源最后皈依佛门,王韬晚年耽于酒色甚至吸毒。著名的《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到后来迷信道教到了荒唐的地步。《晚清》的作者热情赞赏他们的远见卓识之余,责其“思想敏锐而行动怯懦”,“甘当配角”。当然就个人而言,每个人都有其弱点,但是就总体而言,与其苛责于前人,毋宁说这是时代的悲剧。在19世纪下半叶他们只能提供一些思想,却不能提供中国所需要的改变政体的革命。至于自己到前台唱主角,独树一帜,直接唤起民众,以先进的思想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那是下一个世纪的事了。不过作为思想家,他们所起的开拓作用功在民族,不可磨灭。

围绕着爱国问题的争论归根结底是国门打开以后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外部世界之争。每个爱国者心目中都有一个问题:什么是救国利民之道?犹如天下父母莫不爱子女,但是有的溺爱护短,有的爱之深而虑之远,而责之切;父母多有望子成龙之心,而如何培养子女成才取决于父母自己的眼界和世界观。重要的还是本文一开始提出的衡量爱国和卖国的坐标放在哪里的问题。这个问题今天仍需要一再提出,是因为无论是在对待历史和对待现实中并未完全解决。有意思的是,《晚清》的作者自己还认为有必要在卷首表明:“本书严厉谴责了列强的侵略和压榨”,只是由于旨在本着孟子“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的古训进行探索,因而没有把大量篇幅放在分析众所周知的事实上。这一申明看来似乎多余——本来每一本书都有特定的主题,不可能面面俱

到——其实并非多余，正说明我国特有的国情。时至今日写这样一本书还需要做这样一个说明，是发人深思的。

爱国本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如同爱家、爱亲人一样发自内心，不是别人强加的，当然也和爱家和爱亲人一样包含着道义和责任，乃至牺牲。但是外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爱得这么痛苦，“虽九死其不悔”；为爱国而要在本国忍受那么多误解、屈辱，甚至累及生前身后名。近邻日本是民族主义极为强烈的民族，但更多表现在处于弱势时“反求诸己”的能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是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知识界、政论家以及艺术作品对时弊的深刻尖锐的揭露和批判而发展起来；近年来，“美国衰落说”在国际上颇为流行，其中讨论得最起劲、危机感最强的可能倒是美国人自己，当然也有相反的意见，但是根本不能想像在两派辩论中会涉及爱国与否的问题。衰落论者也不必先表白这是出于爱美国之心，并无灭自己威风之意。同样，他国持美国衰落论者也不会被认为是美不友好。为什么国人在爱国问题上有那么多复杂的心态呢？辉煌的古代史与屈辱的近代史造成了种种扭曲心理，把盲目排外与民族气节、一味封闭与抵御外侮、正常交往与卑躬屈膝、学他国之所长与崇洋媚外、审时度势维持对己有利的和局与卖国投降混为一谈。深层次的是自卑和缺乏自信，尽管有时表现出来的是虚骄之气。新中国成立之后又有一段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强于我的国家处于敌对关系的经历，新仇加旧恨，正当的民族自尊心与历史遗留下来的扭曲心态交杂在一起。在一切服从现实政治需要下，学术界对待历史也只能遵守划一的教条主义的标准。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发展到登峰造极时竟至在20世纪60年代还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那种与义和团如出一辙的群众“革命”行动。现在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开放的历史时期，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关系空前紧密而复杂的世界中何以自处，仍是不断向每一个中国人提出的问题。爱国主义仍然是当前倡导精神文明中的主旋律。如何理性地、从中华民族的根本需要出发对待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想，20世纪末，乃至“跨世纪”的在位与在野的思想精英们理应比19世纪中叶的先辈心胸更为宽广。什么时候中国人能真正不卑不亢地以平常心对待世界一切强于我或弱于我的国家，既充满民族自信又虚心学习他人长处，既懂得保持民族精华，又能以开阔的胸怀对外来思想和文化吞吐自如，那就是我们民族真正在精神上健康成熟的时候。

【读后】

中国近代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历史时段，不仅因为历史本身的丰厚，也因为历史解释的复杂。这其中，无论对于历史的参与者，还是历史的解释者，爱国都是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

生于斯，长于斯，爱国，是人的一种近乎本能的自然情感。温情脉脉的时候，它如

水般清澈，同光一样明朗。可是当历史的因缘际会赋予它以沉重的，甚至是难以承载的内容时，揪心的疼痛与深刻的苦闷便时时纠缠着历史当事人，也纠缠着后来者。

相比传统的生存环境，近代士人们的处境要微妙得多：他们走在传统的修齐治平之路上，却被历史车轮裹挟着加入“华”“夷”大合唱。尤其是那些立在历史潮头的人们，处在传统与近代、中国与西方、强国与御侮的夹缝之间，价值与人格的分裂伴随着他们，矛盾与彷徨伴随着他们。当“盲目排外与民族气节、一味封闭与抵御外侮、正常交往和卑躬屈膝、学他国之长与崇洋媚外、审时度势维持对己有利的和局与卖国投降”混为一谈的时候，一沾洋务便成假洋鬼子，一提议和便成卖国，一主西学便是大逆不道。郭嵩焘，仅仅因为作了驻外使节，便遭湖南一省士绅之口诛笔伐，甚至被开除“省籍”，身败名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谁是国家的功臣，谁是国家的罪人，真的需要我们廓清历史的迷雾，找到一个“爱国的坐标”。

爱国，首先是一种感情，但又不能仅仅停留于这种感情。喊喊口号泄泄怒火，只要真诚，固然无妨；即便是不计后果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也还能予以原谅。但是，倘若爱国仅仅停留在这样的水准，爱不爱国于国何妨？爱国需要热情，更需要理性。有了理性，才不至于在屈辱时像阿Q那样自慰自欺，也不至于在顺利时自我膨胀。我们曾经以“天朝大国”自居，即使在摇摇欲坠的时候依然放不下“天朝大国”的架子；我们也曾经许下十年赶英十五年超美的豪言壮语，誓言要做世界革命的中心。直到今日，还有许多人做着各式各样拯救世界的美梦。这一切，曾经让我们心潮澎湃，让我们豪情满怀，谁敢说这些言行不是“爱国”？可有目共睹的是，这些言行究竟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究竟该怎样“爱”这个国家？我们需要在新的坐标下思考。

偶像破坏论

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思想和事业对后世影响巨大，而个人命运却十分困苦，穷愁潦倒病死于四川江津。他曾自述一生：“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辩诉状》）

“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这句形容偶像的话，何等有趣！

偶像何以应该破坏，这几句话可算说得淋漓尽致了。但是世界上受人尊重，其实是个无用的废物，又何止偶像一端？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世界上真实有用的东西，自然应该尊重，应该崇拜；倘若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人人尊重他，崇拜他，才算得有用，这班骗人的偶像倘不破坏，岂不教人永远上当么？

泥塑木雕的偶像，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有人尊重他，崇拜他，对他烧香磕头，说他灵验，于是乡愚无知的人，迷信这人造的偶像真有赏善罚恶之权，有时便不敢作恶，似乎这偶像却很有用。但是偶像这种用处，不过是迷信的人自己骗自己，非是偶像自身真有什么能力。这种偶像倘不破坏，人们永远只有自己骗自己的迷信，没有真实合理的信仰，岂不可怜！

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古代草昧初开的民族，迷信君主是天的儿子，是神的替身，尊重他，崇拜他，以为他的本领与众不同，他才能居然统一国土。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

且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事到如今，这等不但骗人而且害人的偶像，已被我们看穿，还不应该破坏么？

国家是个什么？照政治学家的解释，越解释越教人糊涂。我老实说一句，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那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可见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亦无什么真实能力。现在的人所以要保存这种偶像的缘故，不过是藉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罢了。（若说到国家自卫主义，乃不成问题。自卫主义，因侵害主义发生。若无侵害，自卫何为？侵害是因，自卫是果。）世界上有了什么国家，才有国际竞争。现在欧洲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但是世界上多数的人，若不明白他是一种偶像，而且明白这种偶像的坏处，那大同和平的光明，恐怕不会照到我们眼里来！

世界上男子所受的一切勋位荣典，和我们中国女子的节孝牌坊，也算是一种偶像。因为功业无论大小，都有一个相当的纪念在人人心目中。节孝必出于自身主观的自动的行为，方有价值；若出于客观的被动的虚荣心，便和崇拜偶像一样了。虚荣心伪道德的坏处，较之不道德尤甚。这种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却是真功业真道德的大障碍！

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

【读后】

“五四”的精髓之一就是摧枯拉朽式的“破坏”。破坏，破坏，破坏一切现存的“神圣”。只有这种扫荡一切的“破坏”，才有可能掀翻鲁迅先生所说的那座“万难破毁”的“铁屋子”。

读着“五四”干将陈独秀这篇痛快淋漓的短文，我们仿佛能听到一座千年古屋在“格喇喇”地动摇。

对“五四”的这种“破坏”，有人颇有微词，认为有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之嫌。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再看看陈独秀当年要扫荡的某些偶像是否依然高坐神坛？是否

依然在人们心中作祟？如此一想，答案就不言自明了。

说到底，“崇拜”本身就是一个人心态、思想不成熟的表现。健康的社会不是崇拜什么英雄，而是尊重每一个单个的人。一句西谚说得好：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都跪着。